

诚

信

辨

析

□ 洪跃雄 (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泉州 362021)

摘要: 诚信既是一种完整的德性或德目,也可看作是两种德性即诚与信的辩证或复合。在传统的道德理念中,诚与信具有相近之处,又有较大的差异,对二者进行辨析,把握二者的辩证统一性,对现今进行诚信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诚; 信; 诚信社会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06)01-0072-04

诚信既是一种完整的德性或德目,也可看作是两种德性即诚与信的辩证或复合。在古典伦理中,诚与信合用比较少见,中国汉代以后的被奉为“五常”即五种基本的德目中,只有信而没有诚。《四书》虽有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但也未见二者并列。这说明在传统伦理学中,诚与信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德性或德目。在传统的道德理念中,诚与信具有同一性,又有较大的差异,对二者进行辨析,把握二者的辩证统一性,对现今进行诚信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诚与信的相近性

传统“诚”与“信”均有“实”的含义,意义相通,甚至相互解释,如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诚,信也。”“信,诚也。”唐朝杨倞在给《荀子》做注时,曾说:“信者,诚也。”同时,对诚和信的论述一直如影随形,相伴左右。如《荀子·不苟篇》中就有“诚信生神”;《贞观政要·诚信》中有“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程颐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①;在陆贽的《陆宣公文集》卷三中有:“人之所助在乎信,信所立在乎诚。循诚于中,然后律众无怨。存信于己,可以教人不欺。惟信与诚,有补无失。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

“诚”作为一般概念,具有真心实意、无妄不欺的意思,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尚书》言

“诚”,一般指人们笃信鬼神的虔诚心理。《中庸》认为,“诚”是人生最高境界,人道第一原则,是在实行智、仁、勇三达德,且行为无不合于道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的境界,“诚”就是真实无妄,是天的根本性征。“诚者,天之道也。”《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王船山说:“诚也者,实也,实有也。”^②即诚是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所普遍固有的确实实的实有,真实无伪、实有不虚。朱熹也认为:“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③因此,诚的对立面是谎、伪。谎,梦言也;伪,诈也,不诚的表现就是弄虚作假。

信的基本含义是诚实不欺,遵守诺言,言行相符,是诚实、不欺、讲信用的意思。对于“信”,经典的描述来自于《诗经·卫风·氓》:“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信”的本意是“从人”、“从言”,许慎说:“信,诚也,从人言。”指人所说的话、许下的诺言和誓言等;“人言为信”,是对某种信念、原则和语言发自内心的忠诚。“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④信是对誓言的遵守,是对规则的遵从。杨雄认为:“或问信,曰:‘不食其言’。”^⑤《释名》也曾指出:“信,申也,相申述使不相违也。”意思是人们的行为应该是其言语的相应延伸。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诚”、“信”虽然有多种解释,但其基本含义都是真实不欺。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诚信就是诚实不欺,恪守

信用。推而广之,诚信的道德要求就是心想、口言、身行的一致,即言为心声,言行相符。

二、诚与信的区别

(一)“诚”与“信”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

1. 儒家思想中的“诚”是一种本体论。《中庸》中有“诚者,天之道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天地之“理”是“诚”;又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万物之“理”也是诚,没有“诚”,宇宙万物就不可能存在。“诚”是人应该努力“尽心”、“尽己”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一旦达到这种“诚”,则便进入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的道德境界,倘若达到“至诚”、尽己、尽人、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2],则“合内外之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北宋周敦颐也说:“诚,五常之本,百性之源也”^[3],把“诚”当作一切伦理道德的根基。

2. “信”只是一种具体的德目,涵义较窄。如孔子特别强调两方面的信:一是朋友之间的信,但“朋友有信”的说法表明了原始儒家的“信”的观念并不是指称一种抽象的美德,并不是指一个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的人仅仅出于自我的道德修养的考虑而将“信”作为一个必须达到的美德,“朋友有信”所着意的,恰恰是建基于伦理之上的美德,即只有在对待朋友时,“信”才是一种必要的美德。所以,规范朋友之伦的“信”也就不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美德。二是对民众的信,孔子讲:“民无信不立”^[4]、“信则人任焉”、“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5]。这里就不仅有个人交往之信的问题,还有一个政治责任的问题,也就是“大义”的问题。“信”具有政治意义,必须从政道、从大义,履行它有一定的稳定天下、使民获利的意义。但这种“使民信任”毕竟和作为基本道德义务的“诚”、“信”有差距,是一种非绝对和不严格的诚信观。后来的宋明理学家光大了这一思想,由强调外在的五常转为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地位似更下降,“信”只起证实四者的作用,而本身不受重视,如伊川说:“性中只有四端,却无信,为有不信,故有信字。”^[6]朱熹也说:“木仁、金义、火礼、水智各有所主,独土无位,而为五行之实,故信亦无位而为四德之实也。”^[7]

3. “诚”是进行道德修养的心理基础。《大

学》中“诚意”是所谓“八条目”之一。朱熹注解:“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实其心之所发,与其必自谦而无自欺也。”朱熹还认为“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8],实现自身修养,首先要做到真实不欺,真心实意,若是无“诚”,则就无“孝”、无“弟”,也就达不到修身的目的,达不到“诚”的道德境界。真实不欺的“诚”是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诚”的方法。

4. “诚”高于“信”,为了“诚”,可以毁弃“信”。传统道德既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9],又有:“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10];“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1]言“信”行“果”在人际交往中固然重要,但在至高的“诚”面前,言“信”行“果”的人不过是“小人”罢了,为了“诚”,毁弃“信”是应当的。

古人重“诚”,由“诚”而“明善”,“诚”的道德境界是每个人都应追求的目标。相较“诚”,“信”是次要的。这一点不同于今天的“诚信”范畴更注重“信”,强调行为上的对他人的尊重,有诺必践,更重从外部容易判别的、表现于外的“信”。

(二)“诚”与“信”在使用时的语境不相同

1. “诚”更多指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诚”是不欺心诚,指内心的诚实,往往指涉一个人针对自己的一种态度,更多地指向主体自我的修养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德性和道德境界。“诚”首先是诚于己,即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然后才是“忠恕”所要求的“诚以待人”。儒家的“诚”后来朝着为己之学的方向发展,所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诚者,圣人之性也”。宋明理学更对道德主体的内心操守提出了极致的要求,明代心学家王阳明认为:“意既诚,大段心已正,身已自修”^[12]。

2. “信”是“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更多是指针对社会群体提出的双向或多向要求。信,从字形来看,合人与言,乃言而有信之意。言说是人类的交往方式之一,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因此,信是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应该持有的品质。“信”是个人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不欺骗,它必须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朱熹指出:“诚者实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许是人体出来方见。”^[13]“信”是不欺人,往往指涉一个人针对他人的一

种态度,表现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与朋友交,言而有信”¹⁹。“与国人交,止于信。”“信则人任焉。”无论是信任、信用、信誉,都是发生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上。人每天都要说话,要对他人做出一定的承诺,而是否践履诺言,就是一个是否守信的问题。

三、诚与信的辩证统一

(一)“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体系中,诚是信的基础,故有“不诚者失信”、“诚故信”之说。在古人看来,只有诚“有于己”,信方能“见于物”。孟子把“诚”、“信”二规范联用,阐释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和规范意义:“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²⁰可见,在孟子看来,诚是信的基础,有诚自然能信,无诚也就无信。诚是体,信是用;诚是本,信是末;诚是内,信是外。诚身而立信,自己要先做到诚,然后才能向人示信。无诚,则信如水中浮萍、墙头芦苇,没有根基。诚是信的基础,惟有人内在道德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真正做到守信。缺少了诚作为信的根据,信就无法保证。

(二)“信”是“诚”的外在体现

“信”是“诚”在行为中的体现和展开,“诚者,合内外之道,便是表里如一”²¹,张载认为:“诚故信,无私故威。”²²一个诚实的人只有做到了守信,才能将自己的诚实和诚心表现出来。每一个道德个体的诚,都是建立在信——信誉、信任、信用——上的,只有在这信上,才见出人的诚。

正是着眼于“诚”与“信”的这种内在统一,隋唐前后的思想家把“诚信”作为一个统一的道德规范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人“虽有仁智,必以诚信为本。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欺诈为本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损,善名不减。小人虽贵,恶交不阵”²³。今天我们把这两个概念组成一个词,不仅因为它自古已有,而且因为两者密切相联,形成了一个辩证统一的概念,即是说,诚和信的意义合在一起,是协调、

调整人际关系的一种最基本的伦理准则。

四、诚信关系的现代意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在人类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均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是个体道德的基石,是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是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诚信的缺失将是一种社会灾难。切实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当然,进行诚信建设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们从传统道德中的“诚”与“信”的辨析中得到下面一些启示:

(一)现今社会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之一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对资源和要素占有的不均等和不对称,信息获取不均衡和非对称现象都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都是必然的。这就给不诚信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前提条件。人们自知拥有对方所不知的信息,而且内心希望通过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使自己获利,利用这种优势去满足自身利益要求。这就诱导了不诚信现象的发生。而传统的诚信观具有亲缘性和地域性,在相互熟悉的圈子内,人们崇尚诚信,努力践行;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是相对称的,如果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就会遭到乡邻的唾弃。因此,伦理上的亲疏远近决定着美德的有无。在面对陌生人时要做到诚信则不易,一旦超出宗法人情的小圈子,就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就会戒备、猜疑、疏远。而现代社会的变迁不仅导致亲密关系的变革,而且,我们与陌生人的频繁交往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在现代社会,诚信问题之必要性也着意于与陌生人的交往上。但传统的诚信仅局限于熟悉人群,没有普遍化为社会伦理,因而无法适应社会交往广泛、价值取向多元的现代社会的要求,不足以为市场经济提供赖以支撑的价值根基。

(二)法制建设对重构诚信社会的重要性

传统的诚信强调自律,重视个人修身养性,所谓“不愿乎其外”,“反求诸其身”,而忽视他律,忽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诚信实践便主要体现为宣教,即通过模范人物的确立和义理的宣传来形成民众的道德观念。至于诚信行为(道德行为)的养成,则主要靠个体的自我约束。所以我们有“一诺千金”的故事,有大量关于晋商、徽商诚信经商的故事,却鲜有商业经营的诚信准则法规。诚信在实

践应用中与其说是道德行为规范,不如说是理念。它停留在高度浓缩的义理要求上,缺乏操作层面的可为与不可为的制度规定。因此,如何解决诚信缺失的问题,自然首先应从机制上、制度上入手。正如近年来许多学者多次提出的那样,当务之急应建立、完善诚信信息系统;建立、完善惩罚机制,使不诚信者及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至于再度得逞,使诚信者因诚信而得益。尽管法律惩罚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实现最终没有处罚和不需要处罚。然而,对失信者如果不给予法律处罚,或者不加大处罚力度,必然会产生“羊群效应”,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失信行为。失信的惩罚机制对于市场上的失信行为所进行的打击必须是实质性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决不能是轻描淡写的道德谴责。

(三)在建设诚信社会的过程中应注重对个体的诚信心理的研究

从诚信的概念来看,“诚”这个字本身就包含有心理方面的因素,“诚由心生”、“内诚于心,方能外信于人”。可见,“诚”本身与人的心理认知水平就是密切相关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意识观念就会相应地有外在的行为表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强调诚信的心理机制、心理要素是很重要的。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主观上存在的无知、从众、侥幸、不平衡和吃亏等不良心理因素,是失信行为的内在动机之一。社会心理学对于诚信的理解不仅解释了人们的诚信关系如何产生,而且也能为诚信教育的可能提供了基础。“信任产生自人的本性,信任的扩展有赖于习俗和理性,有赖于社会为其提供的制度系统。”^①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证明:人人都有向善的心理倾向。这种向善的心理倾向使人的一言一行原本总是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人的本性中的这种“向善性”或“善端”为诚信的内化教育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诚信教育之所以可能,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指向人的善良,与人的向善本性保持高度一致,是把人的固有的善端发展到外面去,而不是把人性中所不具备的善加到人性上面。”^②因此,理解诚信行为的心理基础和人格特性是对诚信研究的一种扩展和深入,也必将为如何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一种认知模式。

(四)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诚信的最高境界和要求是诚实信仰、忠诚信奉,诚信社会的建设在理论教育上应遵循由诚而信的逻辑。因此,诚信社会的建设从源头上来说

还应该从道德观念层面解决问题,建立对诚信的心理认同。

诚信所要求的是内诚外信,互相补充,诚信的根底在人内在的道德品质。从道德本根来讲,诚信本身就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具体到道德个体的身上,诚信的力量来自于对外在道德评价的敬畏心理,最终来自于人对自身内在属性的发扬,诚信的道德规范的真正实施,必须诉诸于主体的信念,真正内化为主体的德性。这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不能仅系于契约,而必须系于信仰”^③。因此,我们在当今的诚信道德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诚信的外在规范功能,还要强调诚信所具有的内在德性价值,使诚信社会的建设从“规则诚信”走向“美德诚信”。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诚信的各项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的同时,也要对中国传统的诚信美德进行扬弃、改造,从中汲取有助于补救当今社会诚信危机的成分。

注释:

- ①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5。
- ② 王船山:《尚书·马以》。
- ③④⑤ 朱熹:《朱子语类》卷119、卷6、卷23。
- ④ 袁采:《袁氏世范》。
- ⑤ 杨雄:《法言·重黎》。
- ⑥ 《孟子·尽心上》。
- ⑦ 《中庸》第22章。
- ⑧ 周敦颐:《通书·诚上》。
- ⑨ 孔子:《论语·颜渊》。
- ⑩⑪ 孔子:《论语·子路》。
- ⑪ 《二程遗书》卷18。
- ⑫ 《朱子文集》卷56。
- ⑬ 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 ⑭ 孔子:《论语·为政》。
- ⑮ 《孟子·离娄下》。
- ⑯ 《王阳明全集》卷1。
- ⑰ 孔子:《论语·学而》。
- ⑱ 《孟子·离娄上》。
- ⑲ 《张载集·诚明》。
- ⑳ 中华思想宝库编写组编《中华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 ㉑ 邢媛:《诚信研究的几种维度分析》,《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6期。
- ㉒ 禹旭才、宋元林:《论对青少年诚信品质培养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 ㉓ 卢凤:《论当代中国的诚信危机》,《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责任编辑 陈金清)